



周年图鉴

1

参与率90%背后 志愿者的去与留

今年5月1日，新修订的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实施满一周年。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，目前北京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%，参与率达到90%，准确投放率在85%左右。与《条例》实施前相比，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增长了11.6倍，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长了46%。

在这一年里，由于可操作、见效快，桶站值守已经成为垃圾分类这项社会活动的底层方法。据顺义区后沙峪镇江山赋社区党支部书记亓伟伟介绍，每天早晨7-9点和晚上6-8点，社区分派了专职守桶员看管。由于部分居民选择在正午投放垃圾，链家党支部负责在每天13-14点桶旁监督。

丰台区王佐镇南宫雅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京梅说，一年来，居民分类意识较以前提高了不少。社区派了志愿者早、晚值守，大部分是社区居民，和物业的垃圾分类员加起来共110人左右。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宣传、引导。但由于未设置分拣员，当分得不好或是人家着急上班，志愿者们起初也会拿夹子帮忙分一下。

“垃圾分类的初始阶段，主要用被动监管来约束。但实操过程中，随着桶站志愿者和二次分拣员的职能逐渐模糊。不少时候，居民的确会有碍于情面，采用自己二次分拣，减少邻里摩擦的情况发生。虽然分出率的提升速度肉眼可见，但这种操作未来仍有改进的空间。”反思过去一年社区垃圾分类管理经验，夕阳再晨公益团队垃圾分类项目主管李紫莹说。

有居民坦言，每天按部就班将厨余垃圾破袋入桶并非易事。天然、异味和溅出的油渍都是羁绊。于是，不少人选择值守时间外择机投放。丰台六圈村则想了个办法，他们在桶旁放置了挤压式免洗手液，以应对大伙儿关于“垃圾破袋”的诸多担忧。“我们把服务递到居民手边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自己。”海淀区二里庄社区党委书记魏立曾说。

然而相较追赶剩余20%的指标，社区的更多心事仍是如何能保持既有的胜利。对李紫莹的团队来说，垃圾分类更像是一项严密的课题，任何微妙的变化都会带来其对整项行动每个环节的重新检视。对于很多社区而言，桶站志愿者数量出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。尤其是对老旧小区，志愿者主要由居民组成，定时定点守在桶旁，时间长了难免会迷茫。

虽然在她看来，未来垃圾分类最理想的效果是居民实现自主分类，但眼下，志愿者的增减却着实关系到社区垃圾分类的效果。去年，桶站志愿者的服务是无偿提供的，但今年学院路城管科开始给志愿者们拨付劳务补贴。差不多是每人每月300块钱，但这个钱会随着社区垃圾分类的考核结果而波动。

“其实北京市内的各个社区都可以考虑给志愿者一些福利，把巡视员工工资稍微提高一点，他们有点责任心，自然会做好。”高碑店乡兴隆家园小区居民李女士建议。

2

社区物业协作缺口 模糊的力量分配

统一拨资金的确能暂时消解掉部分的不确定，但社区间情形各异，志愿者流失带来的连锁反应才是更让社区担心的。垃圾分类理论上是社区和物业联合进行的。但对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来说，很多时候，包括统筹志愿者在内的事情，还是会由社区来最终兜底。”李紫莹说。

实际上，北京垃圾分类已试行多年，由于社区端管理和配套等力量有限，行动被拖至去年再吹号角。只是这一次，为了不重蹈当年覆辙，加强物业联合也被重点提上日程。去年5月1日，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同时落地的还有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，关联性不言而喻。

报道组走访期间，社区和物业关于各自职能的解释大同小异。按照杨京梅的归纳，物业在垃圾分类中承担主体责任，居委会负责指导和监督。“我们和物业有个群，社区每天在守桶和巡桶的过程中，发现分类不彻底的情况，就拍下来发到群里，让物业清理，逐渐也形成了一套长效协作机制。”

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中曾提到，物业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履行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责任，指导、监督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，但落实到具体的实操层面，社区与物业间却很难实现泾渭分明的力量分配。



从有限分类到无限协作

时隔一年，再访海淀二里庄小区，一切恢复如常。这一次，志愿者们不用守在厨余垃圾就地处理器旁，向络绎不绝的客人介绍这个新鲜玩意儿。他们重新回到会议厅，几人一组地坐在桌前，严谨得像对待一道有多元解法的命题。

在讨论中他们发现，垃圾分类周年告捷的背后，是社区力量的强监督。但一年过去了，以被动监管为开端的垃圾分类在重新出发之前，也必须要厘清一套更系统的方案。如果说垃圾分类社区治理1.0版本瞄准的是桶前值守，那么2.0版本瞄准的可能就是社区与物业这两个垃圾分类的中坚力量，究竟要如何配合。



产权、成本错综复杂 双方边走边摸索

虽然前述条例明确了物业要担纲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的角色，但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，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梳理。目前能确定的是，社区与物业协作的缺口不是靠彼此迁就便能弥合的。

以和平里街道为例，在整体垃圾分类的进程中，工作是相对顺畅的。据和平里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，去年新《条例》实施后，和平里街道就开始撤桶并站，并给所有桶站升级。在厨余垃圾方面聘请了专门的垃圾分类公司，主要负责厨余垃圾的清运，其他垃圾则由物业进行管理，且特别严格。四类垃圾都分类运输，不存在之前说的那种居民分类了，但最后却混装运走的情况。

但在社区与物业的配合方面，和平里街道也有它的难题。“有的街道是大物业管理，一个街道只有一个物业，物业就是主体责任人。但和平里街道有20个小区，有的一个小区就有十几个物业，所以主体责任就不太明确。”据该工作人员介绍，单是要给物业组织一次关于垃圾分类的培训，就要组织三场活动；太散了”。

海淀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分析指出，相较高档小区，物业具备足够的实力支撑垃圾的桶前值守、清理和收运。但在老旧小区，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相对有限，在无法发动物业力量的情况下，社区就要不断去动员志愿者，用最传统的办法完成管理。

而在报道组前往的大多小区中，囿于产权单位复杂、物业费用有限等因素，各社区的物业大多时候仍要“边走边掂量”。上述提到的望京西园三区就是个例子，据了解，该社区是北京首批经济适用房，其物业费价格为北京市发改委统一划定。

目前，小区内虽有不少房屋转成商品房，可也仍有大量房屋产权并未变动，整体物业费的标准较周围小区偏低。同时，小区内租户比例扩大，加大了物业费的收取难度。望京西园三区与四区两个小区同属首开物业，而物业工作人员却不到10人。

同样困于成本的还有光熙门北里北社区北宇物业。对方表示，如今，由于垃圾站对分类有要求，垃圾清运时间延长，之前清运兼保洁的思路需要改变，小区需要另聘保洁人员，相应的成本自然会增加。虽然社区服务要求提高了，但由于是国企，没有政策变动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自行调整，所以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物业费水平，压力也不可避免。”

困难摆在这里，但不意味着没有解题的思路。相较于停留在宣传阶段的社区，后沙峪镇江山赋社区购买了爱分类作为服务第三方，承接可回收垃圾清理。除了居民志愿者，物业方的保洁人员兼职桶站值守。这套机制运作起来已经是条不紊，却也是再三权衡后折中的结果。

“按照规定，垃圾分类每个桶站都要有人看守。以前社区有38组桶，就得38个人看守，但物业费里也没有这笔费用，于是撤掉了原来的一些桶站，仅保留6组。去年四季度，物业要派人全天看桶，这样下去全年要增加30多万元的支出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最终决定让物业保洁和社区志愿者联合守桶。”亓伟伟说。

底层方法到顶层制度 亟须明确的奖惩机制

“往往社区与物业的合作过程中，很多事情社区是可以与物业协商解决的。但其实不解决也没有办法。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顶层制度。当然，难度不小，具体需要细致到哪个层面，目前没有一套确定的标准。”柳春英坦言，在与物业配合的过程中，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带领社区居民做自我管理，她所在的小南庄成立的物管会主要是发挥党建引领和桥梁作用，帮助产权单位、物业公司找到自身定位，增强其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；同时也帮助业主转变观念，明确自身权利义务，更关注公共利益。物管会能对物业形成制约，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。

去年7月，北京市发布了《关于加强北京市物业管理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三年行动计划(2020-2022年)》，规定社区协助街道(乡镇)对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履职情况、物业服务企业履约情况进行考评。随后，全市各社区也根据规定，定期评定物业服务。但在收集的社区样本中，部分社区的考核指标内，尚不包含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事宜。

虽然明确了物业是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责任人，可关于垃圾分类奖惩措施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也仅明确，物业服务人员未履行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责任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照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在垃圾分类行动落地之初，市城管委曾部署全市城

3

4

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